

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

硕士学位论文集

音乐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

硕士学位论文集

音乐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研究生

硕士学位论文集

音乐卷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625 字数503,000 插页1

1987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书号8228·098 定价4.70元

ISBN 7-5039-0023-7/J·6

前 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一九八一届)研究生中,三十九人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现将已获学位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按戏曲历史及理论、美术历史及理论、音乐学专业,分三卷出版。(结集时,多数论文做了文字上的压缩,有的只发表了一部分。)希望文艺界、教育界的同志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提出批评意见。

借文集出版的机会,我谨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和全体同学,向这届研究生的导师、授课老师、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及全国各地对研究生做过热情指导、无私提供过珍贵资料的专家们,向给了研究生工作以大力支持的院内领导、行政、资料等部门和各研究所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 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张 庚
陕西出土西周钟研究	蒋定穗(1)
论郑卫之音	冯洁轩(51)
天平琵琶谱之考、解、译	何昌林(88)
论学堂乐歌	张静蔚(116)
汉族山歌研究	乔建中(152)
粤江流域西部各族多声部民歌研究	伍国栋(219)
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	王宁一(272)
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思维	梁永生(325)
——对一种理论的批评和修正	
关于歌剧重唱几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	居其宏(372)
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	魏廷格(418)
贺绿汀前期创作的风格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谢天吉(457)
古代琴曲打谱集	吴文光(485)
——碣石调幽兰及神奇秘谱上卷太古神品	

CONTENTS

- Preface Zhang Geng
- A Research into the West Zhou Dynasty Bells Unearthed
in Shaanxi Province Jiang Dingsui
- On "Zheng Wei Zhi Yin" — the Music of Zheng and
Wei States during the East Zhou Dynasty Feng Jiexuan
-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TEMPYO BIWAP PU With
Elucidation and Transcription He Changlin
- On the "School Songs" Written in the Early Years of
20th Century Zhang Jingwei
- A Study of the Han People's Folk-song in Mountain
Areas Qiao Jianzhong
- A Study of Folk Songs in "Orgnum-Singing" Style of
Some Minorities in the West Yue River Valley Wu Guodong

Approach to the Musical Images in songs from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sic and Text

Wang Ningyi

Music is a Special Way of Thinking

——Criticism and Correction of a Certain Theory

Liang Yongsheng

Probing into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Vocal
Ensembles in Operas

Ju Qihong

A Review of the Works of Chinese Piano Music

Wei Tingg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e Luding's Early Works

Xie Tianji

A Collection of Transcriptions of Qin Music

——Jieshidiao Yulan and Other Pieces from Shenqi

Mipu (神秘秘谱)

Wu Wenguang

陕西出土西周钟研究

蒋定穗

前言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就乐器而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能制造陶钟、石磬、土鼓、骨哨和多音孔的旋律乐器——陶埙等多种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了。到商代，已有了成组的编铙、编磬、铜鼓、簫、龠、言等多种定音和不定音的击乐器和管乐器，为后世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到周代，又出现了琴、瑟、箏等多种弦乐器。由于乐器种类的增加，出现了“八音”的分类法。《诗经》、《乐记》、“三分损益法”的出现，标志着此时期音乐发展的高度水平。而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东周墓一百多件乐器实物的出土，特别是那六十四件具有标音和乐律铭文的青铜编钟，更以辉煌的事实向我们展示出：周代是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高峰时代。它为以后几千年中国音乐的发展奠定了相当完备的基础。随县编钟的出土，不但证实而且补充了文献中关于周代乐律的记载，也显示出编钟这种乐器在我国早期音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音乐、考古界学者的广泛注意，也提出了许多中国音乐史上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随县东周编钟出现的历史基础和来源是什么？换言之，从商代三件一组的小型编铙发展到战国时期如此复杂完备的大型编钟，其间的发展过程如何？要解决这个课题，首先要对介于商代至战国期间的西周编

钟在二百多年间的发展演变情况做出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即希望能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为此，首先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基础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其出土情况的了解、铭文的分析、实际的测音和测量，标准器的确定和时代顺序的排列，以及对形制、花纹、组合、音律的分析等等。

鉴于目前绝大多数西周钟的出土地点集中在西周王畿所在的陕西关中一带，笔者希望通过对陕西出土西周钟的集中调查和研究，通过对这一剖面的分析而获得对西周钟发展演变的整体认识。为此，1981年5月至6月间，笔者赴陕调查了自解放后从宝鸡、西安、扶风、咸阳、临潼等地出土和收藏的几十件西周钟，进行了实际测量和测音，其结果记录在表I：《陕西出土西周钟调查登记表》中^①。（有些笔者虽未能实际考察但已公开发表的钟，也列入表中。）

在清代程瑶田撰写《鳧氏为钟章句图说》^②，开创了据实物对照文献研究周钟的先例。随后，王国维、郭沫若、容庚、唐兰、陈梦家等先生都对西周钟的发展情况进行过研究说明^③。近年来，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马承源等先生又进一步通过实际测定，对周钟的音律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④。这些研究不断丰富着人们对西周钟的认识，也是本文撰写的基础。

一 西周钟标准器系统的排列

研究某项实物发展史最重要的基础，是确定研究对象的绝对年代及发展顺序。这也是我们首先建立西周钟标准器系统的目的。所谓标准器是指根据自身铭文（不是伪造）可说明制造时期的器物。当标准器确定之后，可以铭文内部的人物或事项为联系，排比青铜器组，做为断代的标准^⑤。这种排比青铜器组的方法是目前较为广泛采用的。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并提出以各器间有横（同时代同器主的）、纵（器主家族几个世代

的)两方面联系的青铜器群为标尺是比较准确地估定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方法^⑥。由于这样的器群是极少的,本文两种方法兼而用之,以确立西周钟的标准器系统。当标准器系统确定之后,就可以通过各种特征的比对确定大量无法自明时期的西周钟的时间位置,从而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比较可靠的基础。

为使西周钟标准器系统尽可能完善和可靠,本文在选择标准器时以出土实物为主,补充以可靠的传世器物。对于一些虽被某些学者认为可属标准器,但或铭文难以自明,或目前尚有较大争议,或实物不存、器类不知者,都没有选择^⑦。所选择的标准器,据铭文都可证明是由周王或王室重臣所铸,其早期发现地点也应该是在陕西关中地区。

穆王时期

编钟(表I, ⑪—⑬)。共三件一组,大小相次,1954年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西周长白墓出土。钟无铭文,据墓中同出一组四件长白所制铜器及长白盃铭文“穆王在下泮居”,发掘报告订此墓为穆王时期^⑧。由此,一般认为这三件编钟可作为穆王时期钟的标准器^⑨。但正如在这座墓中也出土了十二件属于西周早期的铜器,我们并不能明确指定这三件编钟毫无疑问地确属穆王时期,只能认为它们制作和使用时期的下限是穆王时期。

共王时期

应侯钟(表I, ⑭)。1974年3月于陕西省蓝田县出土。此钟铸有铭文上半,铭文下半见于解放前流传到日本的另一件应侯钟上^⑩。两钟原为同组之物。钟铭中的“荣伯”,又见于康鼎、卯殷、敌殷、同殷、永孟等共王时期的铜器铭文,由此可判定这两件应侯钟的制作年代也应是共王时期^⑪。

懿王、孝王时期

疾钟(表I, ④⑩、④⑨—④⑪)。共十四件。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庄白出土。据同时出土史墙盘铭文,史墙是共、懿时人②,疾是史墙之子,疾盨铭文记载疾受命的时间是“四年二月”,应当已是懿王之世③。由于懿王在位只有十年左右,这十四件疾钟可能分铸于懿王及孝王两世。

虢钟。传世共五件,分两式。据钟铭可知为大师虢所造。同人所作铜器尚有大师虢殷、大师虢豆。郭沫若先生定此组铜器为厉王时器④,陈梦家先生辨正郭氏之说,据大师虢与史晨的同时关系定此组铜器为懿王时期⑤,今从陈氏说。

夷王、厉王时期

师丞钟(表I, ⑥⑤)。1974年12月于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钟铭有“师丞肇作朕列祖虢季、寘公、幽叔、朕皇考德叔大鬯(林)钟”,由周共王时的师望鼎铭文可知师望的父亲是寘公⑥。又由同时出土的师觶鼎铭⑦,可知师觶之父即师丞钟所举第一世虢季,“寘公”是师觶的溢。师望与师丞当属同一家族。又已知幽叔是师望的溢,德叔是即的溢,所以师觶、师望、即和师丞当是虢季氏族的一支,是相连续的四世。由师觶鼎铭可确定师觶鼎作于共王八年⑧,师觶之父虢季约为昭王时人,师觶之子师望约为懿孝时人,即的年代在孝夷之间,师丞主要活动时期在厉王⑨,所以师丞钟的制作年代当在夷王或厉王时期。

宗周钟(猷钟)。铭文末句为“猷其万年,畯保四国。”郭沫若先生考证其年代属周昭王时器⑩。唐兰先生认为猷即周厉王的私名胡⑪。这一意见已为学术界公认,今亦从之。此钟可断为唯一一件确属周王自铸之钟。

虢叔旅钟。传世共七件。作器者虢叔旅即鬲攸从鼎铭文所记载的虢旅。由于鬲攸从鼎铸于周厉王三十二年,因此可判定旅钟

亦制于厉王^②或稍晚的时期。

宣王时期

井人安钟。传世共三件。载前铭者二件，后铭者一件。钟铭有“安害害圣遑，害处宗室，衅用乍(作)龢父大龢钟”，郭沫若认为铭文中的龢父即共伯和，安为共伯和子，所以此钟应制于宣王时期^③。

安钟(表 I, ⑧)。1966 年于扶风齐镇出土。与传世井人安钟为同组器物。安即井人安。

经过以上的鉴别选择，我们可以得到西周钟标准器的发展序列。这些标准器分配在自周穆王或更早时期至周宣王大约一个半世纪以上，基本代表了西周中晚期青铜钟的发展。

二 西周钟的纹饰及分期

在陕西出土八十七件西周钟中共有无铭钟四十四件，除普渡村长白墓三钟和宝鸡茹家庄虢伯墓三钟为墓葬出土外，其它均为窖藏、灰窖或偶然出土。在四十三件有铭钟中，上节内我们选了其中十七件做为标准器。那些非墓葬出土又无铭文的钟及大部分具铭钟，都只能依靠自身的纹饰、形制、组合及音响等各方面特点做为断代依据。所以，当标准器系统建立之后，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这些标准器所提供的有限材料去得到一些有关不同时期特征、风格的规律性认识，以作为更多无铭文或铭文内容不能自明时代的西周钟的分期断代依据。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西周中期到晚期，钟在形态上的变化不大(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因此确定时期的依据就必须首先考虑钟上的花纹装饰，这也是我们继标准器系统排列之后，首先研究西周钟花纹的原因。

西周钟上的花纹主要装饰在鼓部、篆间和舞上，有时也出现

在钲间或甬、幹、旋等部位。各部位花纹的变化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特点。

从上节我们知道，目前可确切断代的最早标准器是共王时期的应侯钟。普渡村三钟虽被认为是穆王时期标准器，但实际上并不能准确确定它们的时期，只能确定其制造和使用时期的下限是穆王时期。因此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共王时期以前西周钟的特点及其大致的分期。

普渡村编钟可代表共王时期以前西周钟的一种类型。这三件钟的装饰特点是：(1) 鼓部、篆间的纹饰都为细阳纹。(2) 钲间、篆间以小乳钉纹为界格。(3) 篆间纹饰为∞形云雷纹或波状云纹，鼓部正面为两组对称云纹，每组云纹又由四朵小云纹相互勾绕组成。鼓部四周由双线阳纹勾勒出鼓部形状。(4) 钲间素。(5) 舞部以四组对称阴线S形云纹装饰。(6) 枚细长，旋较狭窄单薄。符合以上特点，同属此型的钟还有：茹家庄出土编钟三件(表I，②①—②②)、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七式钟两件(表I，②③②④)、沔西马王村窖藏出土Ⅱ式钟一件(马王23号)(表I，②⑤)和宝鸡虢镇出土甬钟一件(表I，②⑥)。此期钟以普渡村钟为典型，纹饰的简化形式见于茹墓三钟及马王23号钟；其最简化形式为以双阳线在篆间及鼓部勾边，见于虢镇钟。

过去一种公认的意见是普渡村钟代表了目前所发现西周钟的最早形式^②。笔者通过赴陕调查，对此产生了疑问。因为见到了一类花纹比较特殊的钟，它们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这类钟在宋代《博古图》中已著录过多件，可能因其不具铭文而不被以往金石学家所重视。目前笔者已收集到这种类型的钟十六件。其中包括马王村出土马王22号钟一件(表I，①)、扶风庄白任家村出土钟一件(表I，②)、扶风黄甫五郡西村出土钟一件(表I，③)及临潼零口公社出土钟十三件(表I，④—⑩)。由于这类钟目前全部是从窖穴出土的，还没有从墓葬中发现，钟上也不具铭文，所以过去对其时代的确定往往意见矛盾相当大。如对临潼零口出土

钟，发掘报告认为“可能为东周初期”物^②，而唐兰先生认为是西周后期器物^③。对扶风庄白任家村出土钟、扶风黄甫五郡出土钟和沔西马王村出土钟，则被认为属西周中期^④。

首先，这些钟全部是从窖穴或灰窖中发现的。这一地区的铜器窖藏已发现多起，有关窖藏铜器的原因，已有许多学者论述过，应是西周后期两次大变故中，器物主人逃跑时埋下的。一次是厉王时国人造反，厉王奔彘；另一次是犬戎入侵、幽王灭国、王室东迁时，东逃贵族仓促埋藏的^⑤。其中所藏铜器往往是一个家族连续几个世代之物。可包括西周早期至晚期各个时代物，但不可能有春秋时期的器物。如临潼零口钟就是与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同时出土的。发掘报告认为临潼零口窖藏中的“陈侯簋和编钟的时代，可能为东周初期”^⑥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出土为窖藏本身就否定了它们属于东周钟的可能性。

其次，认为这些钟属春秋或西周后期这种意见可能是据鼓部纹饰与春秋钟的比较。从某些例子如临潼钟和马王22号钟来看，鼓部花纹与春秋时期盛行装饰于鼓部的一种所谓“山形”纹饰是显得有些相似。但经过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春秋钟鼓部多以浮雕状的蟠螭纹、蟠虺纹或蝌蚪纹组成，是以动物纹饰为主体的山形。而此类钟鼓部以双细阳线云纹组成，是以几何纹饰为主体的山形。在被认为属西周中期的扶风庄白任家村钟和扶风黄甫五郡钟上，鼓部四个∞形云纹的左、右下角都有向下延伸形成两个重叠山形的趋势。在西周中、后期鼓部饰有夔鸟纹的钟上，其鸟翼向左、右下角的延伸也具有形成山形的趋势。可以说春秋钟鼓部纹饰山形的特点是从西周就开始了，这大概是古人早已注意到纹饰与鼓部弯于的结构相配合的装饰效果所形成的特点。所以，此类钟鼓部山形的特点，只能证明它们与东周钟之间发展的继承性，而构成山字形纹饰的区别则更显示了其间的时代差异。

反之，这类钟从造型到花纹都与普渡村编钟为代表的穆王或

更早时期的周钟有着极为明显的联系，而它们具有的一些不同于普渡村钟的特点甚至显示出更为古老的性质。

这类钟与普渡村类型钟相似的特点包括：(1) 鼓部、篆间花纹以细阳线纹构成。(2) 钲间、篆间界格以细乳钉纹构成。(3) 篆间纹饰为∞形雷纹，鼓部常以四组对称云纹装饰。(4) 舞部素面或为四组单线S形云纹。(5) 旋狭长或为绳纹装饰。(6) 枚更为细长突出。(7) 鼓右无鸟纹。这些特点都是西周后期标准器所不具备的。

此类钟与普渡村类型钟不同的特点包括：(1) 钲间布满华美花纹，为各种变形云雷纹或由云纹组成的蝉纹。(2) 一些钟上具有的钲间、篆间界格的乳钉纹较普渡村类钟更为细小。(3) 钲间及鼓部的云纹中心常有若干个突起的小乳钉。(4) 钟体瘦长，胎薄。我们说这些不同点甚至显示出更为古老的性质是因为：从所装饰花纹的内容来看，西周钟的钲间、篆间以乳钉纹为界格的装饰是属于懿王时期以前的风格，自孝王时期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乳钉装饰了。在可知属穆王或更早时期的普渡村钟和属懿王时期的虢钟之间，乳钉纹的变化是：普渡村钟的乳钉细小而虢钟的乳钉明显地粗大。在与普渡村钟同属Ⅱ型的钟或稍晚的Ⅲ型钟上，其做为钲间、篆间界格的乳钉纹都与普渡村钟相似，是较细小的一类。因此，由目前实物来看，可以认为西周钟上作为钲间、篆间界格纹饰的乳钉纹的变化特点是：乳钉由细小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大。而此类钟所具有的乳钉纹，正是陕西出土钟中最细小的一类，因此在年代上也应该是具有乳钉装饰类钟中最早的一类。

同时，在这类钟的钲间和鼓部常出现的云纹、蝉纹和乳钉纹，是商至西周初流行的一种纹饰，也应具有比较早期的性质。就整体说来，这类钟纹饰精美繁华，“全身饰以花纹”或背面全素，符合青铜器形制分期中的鼎盛期^⑨，因此我们认为这类钟很可能属于西周早期，它是目前所发现西周钟的最早形式。本文称

这类钟为Ⅰ型钟，而把普渡村类型钟称为Ⅱ型钟。

众所周知，西周中晚期钟上的铭文首先是铸Ⅰ钲间的，普渡村型钟钲间不饰花纹而为素面，说明钲间铸铭的习惯在此时可能已经产生。属于普渡村类型的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七式钟，也正是在钲间具有了图形的族氏铭文。而Ⅰ型钟是较之普渡村型钟更为古老的一类，其钲间饰满花纹，则说明在它们流行的时期，可能还没有钲间铸铭的习惯普及，钲间仅被做为装饰花纹的位置。目前所知最早的有铭钟是属共王时期的应侯钟，至今还没有可确指属西周早期的有铭钟出现。所以我们设想，西周早期钟可能还没有钲上铸铭的习惯产生，其流行的形制是钲间、鼓上饰满花纹。到西周中期便有了钟上铸铭的习惯普及，此时虽已不流行在钲上装饰花纹，但这种形制却一直流传下来，直到春秋乃至战国时期。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Ⅰ型钟是陕西省所出土的钲间有纹饰的西周甬钟。在解放后的考古发现中，其它省份还有几起钲间有纹饰的甬钟出土，它们的分布地点主要在南方两广地区及山东省和湖北省。它们和陕西省出土的Ⅰ型钟相比在纹饰上有三点显著的不同：（1）或鼓部、篆间、钲间花纹由阴线纹构成而非细阳线纹。如：1962年、1963年广东清远出土钟，广西恭城出土钟及山东海阳出土钟均是^④。（2）或钲间、篆间界格没有乳钉纹装饰，其例同上。（3）或鼓右部已出现简单鸟纹装饰，如湖北大悟县出土钟^⑤。这些不同点显示了比Ⅰ型钟更晚的时期特征。尤其在1963年于广东清远出土的七件甬钟上，每面有枚十二个而不是十八个，明显地具有地方特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钟与本文所述陕西省出土的Ⅰ型钟是不属于同一时期相同类型的。它们出现的时期应该比Ⅰ型钟偏晚。在出土报告中，这些钟的年代被认为属西周末期或春秋时期。其实在直至战国时期的出土实物中，也还有在钲间刻铸纹饰的钟存在，如1972年四川涪陵战国墓出土的十四件钮钟^⑥。可以说钲间具有纹饰的钟，自从西周早期出现以来，已

成为一种特定形制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始终存在着，它与钲间具铭钟共同存在和发展，构成了钟的发展史中多样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Ⅰ型钟是早于普渡村类型钟的结论如能成立，将把我们对西周钟历史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目前因为资料不足，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判定Ⅰ型钟流行的时期，只能进行约略的推测，进行推测的基础是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应侯钟。以上讨论过的Ⅰ型钟和Ⅱ型钟是早于共王时期的两类钟，而介于Ⅱ型钟与应侯钟之间还存在着两种过渡类型钟，我们称其为Ⅲ型与Ⅳ型钟。

属于Ⅲ型钟的有马王村出土14—17号一组四件钟(表Ⅰ，②⑦—③⑩)、扶风上宋东渠村出土钟一件(表Ⅰ，③⑪)与扶风刘家出土钟一件(表Ⅰ，③⑫)。这些钟的一部分造型装饰特点与Ⅱ型钟相同，但另一部分特点又显示了从Ⅱ型钟到Ⅳ型钟的过渡。主要表现为鼓部及篆间的纹饰出现了阴线纹，各部的云纹装饰也开始有了变化。最后此型钟有一项需要强调指出的特点即鼓右已开始刻铸鸟纹。(这关系到青铜钟侧鼓音的有意识使用等问题，在本文第六部分将要讨论。)Ⅲ型钟上所铸鸟纹还相当粗糙简单，较其后各期钟的鸟纹明显地稚拙而朴素。

在Ⅱ型钟与应侯钟之间还有一类Ⅳ型钟。属Ⅳ型钟的有：扶风北桥窖藏出土钟乙一件(表Ⅰ，③⑬)，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六式钟两件(表Ⅰ，③⑭、③⑮)和马王村出土18、19号钟两件(表Ⅰ，③⑯、③⑰)。Ⅳ型钟与Ⅱ、Ⅲ型钟显著的不同在于，作为钲间、篆间界格的乳钉纹已消失而代之以阴线纹为界格，并通体纹饰都由阴纹组成。但同时又保留和发展了Ⅲ型钟的其它特点。Ⅳ型钟鼓右的鸟纹已较前生动，并渐形成规律图案。如鸟头上有两小翎，从头部到后背披有一飘举长翎，鸟颈与鸟身上均有线条装饰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Ⅲ、Ⅳ型钟反映了Ⅱ型钟到应侯钟之间在纹饰上的发展变化过程。它们不是互相取代，而可能是逐渐发展、长期共存的。如果说Ⅲ型钟还更多地具有普渡村类型钟的